

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的重建：1896年序言和“内在宽容的精神”^①

[美]耳明 L.拉盖尔 (Ermine L. ALGAIER IV) 著

陈 磊,王成兵,编译

[摘要] 文章依据对威廉·詹姆士^②1896年的《信仰的意志和其他大众哲学论文》序言所进行的历史的和哲学的解读,将詹姆士的早期彻底经验论重置于认知、道德和社会的语境之下,对文本的表层内容和潜在内容分别进行了阐释。着眼于文本的潜在内容,发掘了詹姆士对盲目的一元论者批评思想的精髓,突出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特征。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中的“非理性主义”是由“内在宽容精神”所引导的。詹姆士的新哲学保持了对认识论上的他者的敏感性或关切,并希望通过创造一个更开放的理念和实践的场域来保护他者,而这个场域的基础是尊重差异所具有的价值。

[关键词] 詹姆士;《信仰的意志》;早期彻底经验论;非理性主义;独断论;一元论

[作者简介] 作者:耳明 L.拉盖尔 (Ermine L. ALGAIER IV), *William James Studies* 杂志主编,哲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译者:陈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王成兵,山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 太原 030006

[中图分类号] B71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20)03-0092-07

对詹姆士的彻底经验论的最初表述,我们应当更具批判意识。笔者建议不要以詹姆士后来的思想(例如1904年至1905年间的著作)作为参照来研究他1896年的见解。当我们探究詹姆士早期的彻底经验论时,不应该事先假设该理论与形而上学、纯粹经验、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等有直接的关系,而应对詹姆士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文本进行历史的、题材的和哲学向度的解读。

如果我们在更开阔的视野中研究詹姆士眼里的“哲学”意义就会发现,詹姆士早期的彻底经验论比人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具普遍意义。詹姆士不仅非常关注彻底经验论的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关注它的社会与道德含义。如果我们注意其中一些有关历史和哲学的特定议题,就会发现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叙事,这一叙事集中于詹姆士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作品,尤其是1896年的作品。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重

新定位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的范围、话语的类型以及什么样的人能够生产知识的问题。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詹姆士彻底经验论的哲学概念,提出我们需要远离形而上学的解释,转而关注詹姆士思想中社会的、道德的和认识的维度。紧接着的两个部分以更开阔的视角,对文本的表层内容和潜在内容进行解读——这是威廉·加文(William Gavin)在他新近的成果《聚焦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in Focus*)中使用的解释学方法。其中,第二部分通过聚焦詹姆士对理性和有限视角的批判,突出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特征;第三部分着眼于文本的潜在内容,对1896年《信仰的意志和其他大众哲学论文》(*The Will to Believe &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以下简称《信仰的意志》)序言(以下简称“1896年序言”)进行尝试性解读,这种解读充实了詹姆士所谓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威廉·詹姆士哲学文集》翻译与研究”(17ZDA032)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本文根据2018年11月耳明L.拉盖尔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稿编译而成。

^②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国心理学之父,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的“内在宽容精神”，细化了他对认识论上的边缘人物的辩护。我们从这一部分中发掘了詹姆士对两类人的理解：一是盲目的一元论者，这些人无法看到“他者”的内在重要性；二是认识论上的弱势群体，这些人的信仰体系将自己定位在认识论范式的边缘。总结部分则提出，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中的“非理性主义”是由“内在宽容精神”所引导的。更具体地说，詹姆士的新哲学保持了对认识论上的他者的敏感性或关切，他的新哲学希望通过创造一个更开放的理念和实践的场域来保护他者，而这个场域的基础是尊重差异所具有的价值。

一、根据早期的彻底经验论来重新界定詹姆士的哲学

为把握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中关于道德和社会的深层意蕴，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他对彻底经验论的首次公开讨论。1896年12月，詹姆士给《信仰的意志》作序。该文集包含了他从1879年至1896年的17年间所撰写的10篇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刊登于诸如《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和《斯克里布纳》(*Scribner's*)等通俗刊物，也有发表于诸如《心灵》(*Mind*)、《伦理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thics*)和《心灵研究学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等专业刊物。此外，詹姆士还在各种协会、俱乐部和社会团体中宣讲过这些论文。

(一) 1896年序言中的“非理性主义”

在《信仰的意志》的序言中，詹姆士提出，可以从哲学态度、哲学方法和世界观三个不同的维度理解他的彻底经验论。笔者着重研究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的后两个角度，即作为一种认识论的方法和作为一种具有多元论特征的世界观。两者都包含着认知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倾向。由此，我们能够看到詹姆士彻底经验论中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的、多元化的倾向不仅针对单纯的个体，而且针对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二是詹姆士当时的研究重点关注“边缘事实”，或者说认识论规范以外的事实。

詹姆士在1896年序言中把自己的立场定义为“彻底经验论”并对此进行了方法论意义的解读。他曾担心同行们能否接受这一新观点：“我的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同行们会认为这个见解充满非理性主义，也会认为我的论文从专业角度看上去不够成熟，因此对之一笑置之。然而我要说，我的论

文更应该被看作是对彻底经验论的阐述而非有效性的细致论证。今后我可能会对这一工作作更多的推广。”^[1]

在1896年序言中，詹姆士把自己描述为一位彻底经验论者和多元论者。就像上述所提到的那样，他也假设同行者会把他的学说定位为“非理性”。至于詹姆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似乎不难理解，因为既然他倾力为非决定论、心灵等研究进行辩护，那么很容易预测到，他假设的反对者（实证主义者、实在论者等）会把他的立场视为非理性的。也就是说，由于詹姆士试图为许多“非理性”的观点和体验进行合理性辩护，而这些观点和体验与当下的见解格格不入，他就会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错误的。在反对者看来，研究非理性和非逻辑对象以及为这些研究进行辩护的人，本身可能就是非理性的，是与常识格格不入的。

然而，如果我们在文化、历史和哲学的语境中重新审视詹姆士所做的研究就会发现，詹姆士所假设的理论实际上是他的学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因而我将这个所谓的“非理性主义”作为研究的起点，并重新构建一个框架来理解詹姆士的早期彻底经验论。

詹姆士坚持认为，《信仰的意志》所收录的文章展现了彻底经验论者的态度，尽管这种展现不是以技术性手段而是以颇具戏剧性的形式完成的，“这些文章看起来用某种戏剧性的现实揭示了这种态度自身”^[2]。

然而，尽管詹姆士似乎努力提供一种语境让我们把握他的彻底经验论态度，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确定的解释来说，这种语境还是过于开放和过于模糊。许多二手文献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詹姆士与绝对观念论和实在论的对立立场，这种对立过程实则反映了他如何在英国（和苏格兰）经验论的传统中成长，以及如何解决那些曾经困扰的问题。尽管这些文献集结了对詹姆士的方法论和哲学遗产的见解，但是它们却忽视了詹姆士对处于边缘的或从属地位的观念的兴趣^[3]。在19世纪文化运动的语境下，著名的美国宗教学学者凯瑟琳·阿尔巴内斯(Catherine Albanese)就经常提及詹姆士对处于从属地位文化的兴趣，例如对心理卫生、心理治疗、神秘主义、精神病理学和心灵研究等的重视。

(二) 作为“总能习惯于看到事物另一面”的哲学

詹姆士认为他的新哲学隐藏在独断论中，因而需要探究他的哲学概念的本意、含义及其创新性。詹姆士·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的《哲学和社

会学词典》(*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给哲学下了四个定义,前三个定义涉及自然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第四个定义把哲学的功能阐释为帮助人们建构“具有启发性精神”的跨学科思维体系^[4]。尽管可以把鲍德温的哲学定义作为一个参照来衡量 19 世纪的思想,但是却没有发现詹姆士哲学概念与其他现代思想家有什么特殊差别。

早在 1876 年,詹姆士就提出了关于哲学的一种截然不同的定义。在《我们高校的哲学教学》(*The Teaching of Philosophy in our Colleagues*)一文中,詹姆士提到了非传统的观念以及人的超越自身能力的重要性。詹姆士写道:“如果我们高校的最重要作用是给年轻人一个更开放的思维和更灵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训练特殊技术,那么,我们认为哲学……是所有高校学科中最重要的。无论人们如何怀疑普遍真理的存在……毋庸置疑的是,学习哲学意味着培养一种总能看到事物的另一面的习惯,而不是把日常事物总视为理所当然。学习哲学是使得已经固化的东西再次流动起来,认可与众不同的思维状态。总之,它意味着拥有看问题的不同视角。”^[5]这个定义的重要之处在于,它通过提出不同的认知类型打破传统的哲学定义(即爱智慧)。它不是寻求单一的真理,而是试图通过展示视角的多样性,把握詹姆士的多元论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建立在视角转变的基础上。在这种哲学中,哲学家要学会“想象不同的思维状态”,从平常中找出不平常,并永远追寻不一样的视角。如此,我们的挑战性工作就是在詹姆士的早期哲学思考中寻找其连续性,寻找他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中无所不在的“不同的思想视角”。

在职业生涯的后期,詹姆士曾经在《若干哲学问题》(*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的第一章中再次试图给哲学下定义。对詹姆士来说,这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定义,但它确实反映了漫长而辉煌的“哲学式”的思考。詹姆士用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来对哲学下定义:“最初的哲学状态意味着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完备的知识,它必须包括所有科学的成果,必须与科学保持一致。它的目的只是产生科学,使科学成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谓的‘完全统一的知识’体系。而在现代的意义下,与科学相反,哲学只意味着‘形而上学’。”^[6]

在上面这段话中,詹姆士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哲学概念。现代哲学是建立在科学和哲学的本质区别上;而传统哲学则不需要这样的区别。詹姆士这样评价两个哲学概念:“传统哲学含义更有价值,因为

虽然科学成果越来越丰富但彼此更包容,同时,由于在不同学科的问题中寻求真理需要越来越多的方法论指导,我们也许希望这个词回归到它的本义。也许,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可以再次形成共识并相互提供支持。”^[7]

显然,詹姆士在上述中褒扬了传统哲学,认为它“更有价值”,并期待着哲学能成为斯宾塞所说的统一知识体系而起作用。但当我们面对詹姆士对“科学”的不断批评时可以看到,詹姆士心目中的“科学”并非那个固守独断论和对所谓非科学的事物横眉冷对的事物。詹姆士非常同情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从古到今所作的不懈努力。众所周知,詹姆士把一生中的许多时间都致力于心灵研究,他笃信并经常参与非常规的医学实践,并且更广为人知的是,詹姆士对神秘主义思想有兴趣,也是宗教信仰的热烈拥护者。

一旦把詹姆士对边缘“科学”的兴趣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他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哲学概念就应该被定位在早期和晚期的哲学定义之间。《信仰的意志》一文有助于我们了解詹姆士所作的跨学科努力,他对生理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心灵研究以及宗教学整合在一起进行哲学意义的探索。同时,当我们思考文集中的内容以及它们对所谓的“认识论上的弱势群体”的辩护时,詹姆士的“作为总能寻找到事物另一面”的哲学态度就显露出来了。

二、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和 1896 年序言:表层的内容

威廉·加文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使用解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詹姆士文本中处于表层和内在之间的内容^[8]。表层的内容往往详细地反映詹姆士看待个体、世界以及两者之间动态关系的彻底的和创新的方法。加文坚称,潜在的内容只在其返回到经验时才有“指导性”。潜在内容的这种作用是片面的、未完成的和缺乏确定性的^[9]。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从詹姆士 1896 年序言中找到两个映像。一方面,我们发现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的表层映像,与方法论及其批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文本中潜在的映像揭示了其所深受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困扰。

(一)方法论承诺

詹姆士在 1896 年序言的前几页就提出,要给他的新研究一个简称,以方便读者引用。他写道,如果我必须为论题中提到的态度取一个简单的名

字,我应该称之为“彻底经验论”,尽管这个简称在哲学里容易使人误解。我称之为“经验论”,是因为它更倾向于把事实的最确定结论作为一种假设,易于在未来经验中进行修改。在这里,我们看到詹姆斯开创了一种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因而他把自己定位为经验论者。传统的叙事把思想流派与唯理论区分开来,并指出它们在历史学和哲学上的差异。詹姆斯简化了这种区分,把它归结为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也即肯定了认知会随着经验而改变。詹姆斯将“确定的结论”变成“可以修改的假设”,看似仅仅是表述上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无论对理解他的早期彻底经验论还是实用主义都是至关重要的。

接下来,詹姆斯进一步肯定自己的立场足够“彻底”,可以适用于任何特殊的情况。“我称之为彻底,因为把一元论的准则看作一个假设,不像很多目前被冠以实证主义或不可知论或科学自然主义之名的半截子经验论,它不会武断地认为一元论与所有的经验都一致。”^[10]

在这里,詹姆斯所关注的是任何形式的一元论思想,而不仅仅是某个特殊的形而上学学说。有意思的是詹姆斯对“一元论”这个词的使用情形。第一个情形是以“一元论的独断”出现,意指单一的理论。这一指称的不幸后果就是被频繁地看作特殊的唯理论形而上学,而有悖于它广泛的含义本身。根据鲍德温《哲学和社会学词典》,一元论被定义为一个“可以用于任何一个能在宇宙中看到单一原则的显示或起作用的思想系统的名称”。当詹姆斯提到他的“独断”时就已经相当明确,他不只是涉及到了绝对观念论,而且涉及到了多种一元论思想,例如“实证主义”“不可知论”和“科学自然主义”。

彻底经验论发展到现阶段,所指涉的那些令人困惑的方法论问题,向基本的实践和哲学预想发出了挑战,成为撼动确定性基础的一条途径。然而,它并没有为挑战提供解答,仅仅停留在对认识论(或逻辑)发起挑战的层面。这就解释了詹姆斯的早期彻底经验论是如何在方法论上挑战某种或所有形式的一元论思想以及确定性观念——所有有关事实的论断都应该被当作“在未来经验中易于修改的假设”。

(二) 视角的批判

根据对詹姆斯1896年序言的表面解读,我们已经看到,詹姆斯密切关注独断的认知论。从方法论上看,詹姆斯的彻底经验论立场植根于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并指涉追寻知识活动的所有方面的、咄咄逼人的独断论。然而,由于詹姆斯彻底经验论

的目标触及真理的本性,尽管这个目标是用消极的方式来表达的。通过展示理性和视角的极限,詹姆斯直接唤起了人们对独断论的警惕——独断论形成了视角的垄断和霸权。詹姆斯批判的核心在于:当某一特定观点的“内在清晰性”不足以成为公共的或普遍的状态,它其实总是吞噬掉一部分事实或观点。

在《边界上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at the Boundaries*)一书中,弗兰希西卡·鲍德格纳(Francesca Bordogna)敏锐地观察到,詹姆斯的“新的认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是他的论证方式在不同的理性路径间迅速切换^[11]。也许,当詹姆斯开始搭建方法论和认识论框架的时候,他的初衷是将论证方式迅速转向对道德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讨论,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后来在新的认识论或方法论中重新探索它们的意义。在詹姆斯阐述彻底经验论的基本含义之后,这个曲折的论证体系才出现在序言中,但这并不是詹姆斯唯一一次使用这种论证方式。除非我们密切关注他的论证,否则很容易错过这些不同之处。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詹姆斯如何试图为我们的研究重新指定一个开放的和多元化的方向。

詹姆斯运用他的视角批判对理性进行反思:“假定有比第一次经验发现的更多的统一性,我们也还会找到更多。但绝对统一性,即使我们对它的研究实现巨大的突破,仍然会发现,它依然是一个终极的概念。”^[12]从经验论的立场看,我们往往立足于以往的经验进行假设,随着经验的累积,假设会更深入地触碰到实在的本体和我们的本真,然而不论我们的经验积累到多深,总有一些认知是无法达到的。詹姆斯在《信仰的意志》和《理性的情感》(*The Sentiment of Rationality*)中表述上述观点。詹姆斯说,如果我们面对一个理性无法独立完成的选择,我们“激情的本质”就会代替作出决定^[13]。

随着不断深入詹姆斯的复杂的体系,我们看到了他的认识论转向。他如此解释理性的限度:“在理性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对有限的事实仍然还有看不透的地方,是因为这些有限的事实大部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因而无法被解释。”^[14]为了进一步详细说明视角的限度,詹姆斯对理性的批判简要地应用到了最伟大的哲学家身上。通过比较理性的限度和我们自己的视角,詹姆斯指出,即便某一视角具有“内在清晰性”也必然有其局限:“哲学家在讨论世界时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在一个观点来看是内在清晰的东西,在另一个观点看来也许是外部的。”^[15]重点在于,詹姆斯把某种特定元素的相对性

用在一些被认为是理性的东西上,用詹姆士的话准确地说,“达到一定程度的理性”即意味着到某一个程度为止的理性。这一点是微妙而明确的:詹姆士的讨论中提到了心理学的而非认识论的、理性的元素。

通过在抽象和实践之间的迂回,詹姆士把讨论引向终结。他最终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理解有限性这一理念:“否定性的、非逻辑的东西并未被完全放弃。有些事物,诸如‘命运、机会、自由、自发性、随心所欲’等,从你的角度来说仍然是错误的、他者的、外围的,即使你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有些事物仅仅是事实和给定。在整个世界中,可能所有现存的观点都是这样的。”^[16]

詹姆士简短的论证并没有影响其学说的有效性,因为至关重要,他并不试图就彻底经验论进行技术性的和细致的阐述,而是努力解释为何要把许多相关的论题集中在彻底经验论这个中心议题下进行讨论。詹姆士在《与教师的谈话》(*Talks to Teachers*)的序言中思考了刚刚提出的多元论哲学,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这一哲学来看,真理太宏大了,以至于现实中的任何思想都无法完全把握它”^[17]。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一点,詹姆士甚至借用了19世纪记者、诗人本杰明·保罗·布拉德(Benjamin Paul Blood)的作品名来比喻,“《永远不够》一定是唯理论哲学家关于真理的最后忏悔”^[18]。

三、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及1896年序言:潜在的内容

通过细读詹姆士19世纪中晚期更多文本对其彻底经验论的初步描述,笔者认为,詹姆士不仅通过追随其客观依据和必然性的理想,向独断论和一元论这两种思维发起挑战,而且他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认知的、道德的和敏感的议题与他所谓的“内在宽容精神”直接相关。笔者在以下将梳理这种“内在宽容精神”,因为它与“边缘性思想”^①紧密相连。詹姆士不仅仅通过有选择性地发表演说为来为非理性的他者辩护,而且还试图通过使非标准的事物标准化以及使非理性的事物理性化,把非逻辑的他者合法化为一个有效的知识创造者。

(一)“内在宽容精神”

在詹姆士19世纪中晚期出版的著作中,在是否对某些见解持宽容态度上备受压力。1896年,在对独断论和垄断心理治疗、宗教与科学领域的令人

无法忍受的观点进行长达一年的抨击之后,詹姆士觉得自己的用武之地是在被“宽容精神”所涉及的论域中^[19]。在1896年序言中,詹姆士对不具宽容精神的科学家——或者更宽泛一些称为思想的独断论者和一元论者——进行了批评:“我的批评面向所有这样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盟友;我希望我的书能够促进读者成熟起来,使他们站在我这一边。”^[20]詹姆士为宗教的、伦理的、诗歌的、目的论的、感性的、情感的所作的辩护,在别处将之称为“人生观”,以此来抵御机械唯理论、实证主义、独断论和一元论。

对詹姆士来说,重要的是用宽容的态度来限制思辨和实践领域中的“不宽容”。当我们退后一步来看詹姆士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演讲时,会看得更加清晰。1894年,詹姆士从实用主义出发为替代疗法的合法性尤其是心灵治疗运动进行辩护,他反对马萨诸塞州的医疗登记法案,认为心灵治疗师的工作正在产生疗效,因此他提倡继续使用和研究心灵治疗技术。詹姆士在1897年公布彻底经验论学说后,很快就向生理心理学家们发起了挑战,为有关人类长生不老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宗教信仰合法性进行辩护。更进一步的挑战体现在詹姆士于1896年的行动。在洛维尔(Lowell)所进行的题为“例外的心理状态”的演讲中,詹姆士讨论了心理健康退化的常态化问题。在《信仰的意志》中,詹姆士为信仰的合法性进行理性的辩护。同时,在“心理研究协会会长致辞”中,詹姆士避开了来自“科学”的狭隘攻击,宣称我们修复了“人生观”及其“经验的事实”。

简而言之,詹姆士认为我们需要更小心地评判别人,更小心地判别我们自己观点的真伪。在1896年序言中,当谈到为什么要为宗教假设辩护时,詹姆士提到了一种源于实用主义和达尔文思想的建设性意见——“最自由的竞争”和“对生命最开放的运用”是“最符合适者生存的环境”^[21]。詹姆士坚称,这种毫不掩饰的自由竞争观念植根于“内在宽容精神”,因此,“内在清晰”的事物可以而且应该能够在道德和社会框架内与他人共享。在《信仰的意志》里,他非常明确提出:“我们谁也不该否定谁,更不要互相谩骂。相反,我们应该细致而深入地尊重他人的精神自由。这样,我们才能构建知识的共同体,才能具有内在的宽容精神。内在宽容精神是经验论的荣耀,缺少了它,我们所有外在的宽容都是没有

^①作者认为,按照詹姆士的理解,传统唯理论的认识活动是独断的、严格的、一元的,它处于认识活动的核心、强势、主流地位,相对而言,其他的认识活动(如非理性的认识活动)是宽容的、多元的,它处于边缘、弱势、非主流地位。

灵魂的。只有拥有内在宽容精神,我们才能生存下去并与其共存亡,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看,都是如此。”^[22]

这种道德的、社会的和认识论上的宽容,其实践层面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能够采取一种宽容的、非独断的观念和交流方式,持不同观点的人就无需“深藏不露,悄悄与自己的盟友往来”,相反,他们将能够“公开地生活,在毫不掩饰的状态下与其他人竞争……”^[23]

詹姆士的文集《与教师的谈话》收入了《人类的盲区》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内在宽容精神”置于詹姆士思想体系的最前沿。詹姆士在1896年序言中论及了他在《信仰的意志》中所倡导的立场,首次把彻底经验论描述成一种“明确的哲学态度”,后又戏称为彻底经验论。在《与教师的谈话》文集中,詹姆士后悔没有把《人类的盲区》叙述得更能触动读者。在给伊丽莎白·格兰道尔·艾文斯(Elizabeth Glendower Evans)的信中,詹姆士暗示了这一点^①在他思想中的重要性。在给艾文斯邮寄了这本书后,詹姆士却建议她不用费心去读“关于教师那部分,因为它是无聊的化身”。他进而解释道,“我把它寄给你,只是为了让你读《人类的盲区》,它是我整个个人主义哲学的根基”^{[24][25]}。詹姆士同时提到,对于并不熟悉这一篇文章的读者们,总是不能感知到他者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打开眼界看到这个内在世界,希望我们变得更宽容,更尊重“异质的生活和品格”。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与教师的谈话》的序言,就会清晰看到詹姆士早期彻底经验论的内心写照。就像詹姆士在《信仰的意志》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预测到读者和同事会把这篇文章视为“感情主义”之作。然而詹姆士说,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它把自己和世界观以及道德观联系在一起”。这个观点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与早期彻底经验论的思想相比肩。在两个文本中,詹姆士都为弱势者进行辩护并十分关注事实和视角,他认为,产生不道德和糟糕的认知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视角盲区这一社会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詹姆士把彻底经验论的批判视角和认识论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多元论视角联结一起:“很荣幸,有人阅读我的哲学文集。他们将会知道我指的是多元论或个人主义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真理很宏大,以至于任何现实世界的头脑都无法完全把握它,即使是被称为有绝对权威的人也做不到。生活的事实和价值需要众多认知者来领会,没有什么观点是绝对公认的和普遍的。”^[26]

(二)一个认识论类型:盲目一元论和认识论上的弱势群体

以上是笔者运用表层—潜在解释学对詹姆士文本所作的解读。下面将论及一个发现,詹姆士对彻底经验论的描述聚焦于两种认识论类型——盲目一元论和认识论上的弱势者。

第一个视角是对他者的理想和“至关重要的秘密”视而不见。个体“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去假定他人状态和理想的价值”^[27]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视角意图在认识论上以世界同一化来确立自己观点的主导地位。这种同一性思维,是寻求更大同一性的副产品,它排除了其他观点具有哪怕一点点“正确”的可能。詹姆士谴责实证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和科学自然主义者,认为他们武断地断言一元论“与所有的体验都一致”^[28],对于这类人来说,诸如命运、机会、自由、自发性等等,都毫无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第二个视角在序言中并没有显露出来,而隐在暗处。它在上述同一性观点中是“非理性”的他者,是“错误的、另类的、外围的和可有可无的”。它屈居认知活动的边缘,仅作为一种异常现象存在。对于一元论思维来说,它发挥的“仅仅是外部的数据”的作用。这类所谓“非理性的”“无逻辑性的”或不正常的他者遭到拒斥,正如心灵治疗师、心灵研究者和神秘主义者在詹姆士那个时代所遭遇的那样。

似乎每当詹姆士使用彻底经验论挑战盲目一元论时,他总是为认识论上的弱势者辩护,他认为这些弱势者靠近一元论的边缘。根据这个判断,詹姆士的早期彻底经验论积极地为所谓弱势者的观点辩护。詹姆士认为,这些弱势者的观点其实包含着“真正的可能性、真正的不确定性、真正的开端、真正的终结、真正的罪恶感、真正的危机、灾难和逃亡、真正的上帝和真正的道德生活”^[29]。比如,詹姆士于1894年勇敢站出来反对政府通过立法要求执业医师注册并通过一系列国家考试^[30]。他认为,这一立法有可取之处,因为它有助于根除庸医并使医疗实践标准化,然而这样的做法也将加剧对抗疗法和替代疗法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而且在詹姆士看来,它限制了有益的实验科学的空间,他举了一个很恰当的例子:无论人们认为心灵治疗师的工作有多少局限性,但是心灵治疗师应当有其地位。如果我们把治疗关系描述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系,那么显然,心灵医疗师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1]。

^①指理性不能把握的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译者注。

四、结语：边缘敏感性和把非理性进行理性化

笔者在本文的开始提到,使詹姆士遭到诋毁的“非理性主义”是早期彻底经验论的主要议题。詹姆士在19世纪90年代中晚期对认为能够创造知识的话语方式的研究,为探索于1896年提出的彻底经验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背景。笔者认为,詹姆士的早期彻底经验论哲学应当定位在“知识跨学科统一者”和“心灵的视角主义”之间,前者认同边缘科学,后者承认存在认识论上的弱势群体。这样,我们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詹姆士预言他的同事会把他的理论看作是非理性的。由于詹姆士对遭到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论所排斥的认识活动深表同情,因而有的认识论学者就认为詹姆士及其哲学是非理性的。

然而,一旦我们把詹姆士的“内在宽容精神”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解读1896年序言的潜在内容,关于彻底经验论描述的性质和功能就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结果是,它并不严格地具有可以与唯理论者分庭抗礼的方法论地位,它或者只是对客观证据和必然性的一种理想,或者只对某种认识论提出挑战。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要求我们必须考量它的认识论及方法论批判的社会和道德含义。

通过对内在宽容精神的关注,笔者把詹姆士的早期彻底经验论重置于认知、道德和社会的语境之下,并称之为“对边缘性事物的敏感性”,指一种认识论上的对各种认识活动的位置觉,它在给定的范式里起到意识认知关系的作用。更特殊的是,对边缘的敏感性能够了解发生在边界或边缘的认知的交互性,理解整个信仰体系以及它如何与少数信仰相关联。对詹姆士而言,这种敏感性转化为对边缘观点的认识论上的同情。

从对边缘敏感性的角度看,詹姆士的方法论用两种方法得以展示。其一,展现了他在认识论上关注真理和知识话语的作用范围问题。例如,在《信仰的意志》及其他的一些文章,詹姆士直接关注到独断论者和盲目的一元论者。独断论者和盲目的一元论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绝对可靠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样,彻底经验论使用了一种可错的方法论来主动挑战独断论及其基础,并在实用主义领域充当裁判,来裁决真理以及构成“好的”的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32]。尽管这个议题一直贯穿于詹姆士19世纪90年代中晚期的作品中,但是在他不那么出名

的文章《信仰的意志》中,它是最为突出的。在这篇文章中,詹姆士借助于理性的辩护维护了信仰的合法性。其二,詹姆士具有颠覆性的批判视角壮大了多元论,但也导致了一种可能性,使人们看到了他对认识论的一元论与独断论如何影响个体之间直接联系的批判。除了认识论上的可错性立场之外,詹姆士还谙熟于“非理性”或“非逻辑”观点在社会和文化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越来越清楚的是,詹姆士也在试着为所谓的非逻辑的他者所呈现出来的非理性辩护,也就是说,他在尝试着把非理性的东西理性化,或者把非标准的东西标准化。对詹姆士而言,把特殊的经验事实看作无关紧要的数据或者无意义和无价值的东西,是多元化见解的一个自然结果。然而,如果将这个观点普遍化并将之视为真理,就等同于不道德的和不成熟的认识论。就像詹姆士在《信仰的意志》里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客观的证据和必然性无疑是非常美好的理想,但这个月光照耀着的梦想中的地球上,它们何处可寻?”^[33]

[参考文献]

- [1][2][10][12][13][14][15][16][18][19][20][21][22][23][28][29][33]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7, 7, 5, 6, 20, 6, 6, 6, 6, 8, 9, 8, 33, 8, 5, 6, 22.
- [3]Catherine Albanese. *A Republic of Mind and Spirit*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3.
- [4]James Mark Baldwin. Philosophy [A]. 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Vol 2 [C]. New York: The Mac-Milan Co., 1901: 290.
- [5]William James. *Essays in Philosoph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4.
- [6][7]William James. *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20.
- [8][9]William Gavin. *William James in Focus* [M]. Blooming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xii.
- [11][32]Francesca Bordogna. *William James at the Boundaries*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58, 119.
- [17][24][26][27]William James. *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 8, 4, 132.
- [25]Ignas K. Skrupskelis and Elizabeth M. Berkley.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M].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521-522.
- [30][31]William James, *Essays. Comments and Review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8.

[责任编辑:戴庆瑄]